

红色女县长孙兰

邓伟志

上了年纪的上海人可能都会知道孙兰这个名字。上世纪60年代初,她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为上海的教育事业做出过难能可贵的贡献。她受任于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教育经费不足。可是,上海的教育界依然红红火火。孙兰做工作一贯眼睛向下。她喜欢跑学校。不论是去大学、中学,还是小学,她都不指手划脚,多是倾听基层意见,然后帮下面分析、讨论,一起找出适合市情、校情的人才培养途径。容我夸张点说,刚从岗位上退下来的六七十岁的上海才子,很多是从那时的学校中出来的。不过,孙兰的出名不在上海,而是32岁时任淮安县委副书记。淮安的老百姓说,她身为副县长,却很少蹲“衙门”。她经常背着小挎包到处走访。乡亲们得知她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又是清华第一个女生革命组织“民族互助会”负责人以后,说:“共产党人才多,文武双全。红衣姑娘当县长。”那时,淮安百姓喝水难,孙兰就带领当地妇女成立文渠疏浚委员会,采取“以工代赈”的做法,组织了五千多民工。她又动员驻城部队参加,号召机关干部带头,奋战43天,疏浚工作胜利完成,从根本上解决了淮安喝水难的问题。淮安喝水不难的惊人消息传四方。采访过毛主席的那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闻讯来到淮安采访,发表了题为《女县长》的报道。他称赞孙兰是“共产党的女才子,红色中国的女县长”。战争年代,在淮安,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令人向往。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与国民党的合作,曾设想把中央机关迁至淮安,以便同南京政府联络。后来知道南京政府表里不一,没有诚意,便没迁到淮安。但是,“女县长”所在的淮安从此获得了“小延安”的称号。

音乐家与乐评家是音乐文化生活的一体两面。音乐文化生活的主体自然是音乐家,但它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乐评家的参与和推动。不过,音乐家与乐评家往往是相生相杀、爱恨交织的关系,19世纪奥地利乐评家汉斯力克与德国作曲家瓦格纳就是比较典型的代表。汉斯力克大概是19世纪最重要、最著名的音乐评论家,他的代表作《论音乐的美》推崇“纯音乐”和音乐的“形式美”,全力维护以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为代表的维也纳古典乐派和勃拉姆斯。对当时新潮音乐的代表李斯特和瓦格纳,汉斯力克则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让瓦格纳非常恼火,于是,他在自己的乐剧《纽伦堡的名歌手》中专门塑造了一个反面人物贝克麦萨,借以影射和回击汉斯力克。二战前后,一批乐评家脱颖而出,他们臧否人物,指点江山,其坦率犀利的评论往往能决定一名音乐家的前途。1962年4月,具有传奇色彩但个性古怪的加拿大钢琴家古尔德来到纽约,与伯恩斯坦指挥的纽约爱乐乐团合作演出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排练时,两人发生了分歧,难以达成共识。于是,4月6日音乐会的当晚,伯恩斯坦在演出前破例讲了一段话,将他与古尔德的分歧公之于众,称今晚的演出是“一场冒险”,“正是以这种冒险精神,我们现在将它呈献于你”。这场音乐会引起了轰动,不只是伯恩斯坦的坦诚令人刮目相看,而且《纽约时报》的首席音乐评论家哈罗德·C·勋伯格在音乐会结束后发表了一篇致命性的评论,他认为古尔德没有足够的技术以惯常的速度演奏勃拉姆斯的这部作品。此后不久,古尔德便退出音乐会舞台,将艺术

乐评的“毒舌”

刘蔚

重心转移到录音上。有相似遭际的不止古尔德一人。以《弦乐柔板》闻名于世的美国作曲家塞缪尔·巴伯用现代作曲技法创作了《安东尼与克拉帕特拉》,1966年上演后遭到乐评家的严厉抨击,巴伯的艺术自信心大受打击,从此停止了创作;伯恩斯坦1983年完成了歌剧《宁静的地方》,公演后也被乐评家们诟病,他的作曲活动从此偃旗息鼓。有道是:汝之蜜糖,彼之砒霜。捷吉耶夫是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的音乐总监、首席指挥,近年来又先后担任伦敦交响乐团和慕尼黑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享誉全球。他的日程非常繁忙,三天两头乘飞机前往世界各地指挥音乐会,媒体便将他誉为穿行于世界各地、无私地将音乐带往各处的“传教士”指挥家;但有相似经历的梅塔就没有这一般好运了。梅塔只是说他喜欢飞行,因为在飞机上永远不会有电话来干扰他,他可以安安静静地研读乐谱。梅塔说这是十分客观与合理的事实,却被乐评家贴上了“喷气式指挥家”的标签。这个意味着肤浅的标签一直纠缠到梅塔在纽约爱乐乐团音乐总监的位置上离任为止。面对犀利严苛的乐评家和“毒舌”般的乐评应该抱以怎样的心态?著名指挥家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曾引用英国科幻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的名作《银河系漫游指南》中的一句话,表明自己的态度:“没有什么比光速更快,只有坏消息例外,它们遵循特

那天晚上八九点钟,我从书房踱到阳台上,偶然抬头一望,不由惊喜地赞叹,好一轮美丽的月亮!月亮,不像太阳那样耀耀,不像星星那样渺小,她是那么圆满,那么柔和,那么美丽,让人久久仰望而不忍离去。月亮总是让人想起了许许多多,在我心中荡漾着温暖的记忆。我还是少年的时候,晚上坐在弄堂里乘凉,四周都是人挨着人,让人感到很闷热,很逼仄。说来奇怪,仰望月亮,就不再到感到逼仄了,还有一种潺热消散的凉爽感。可惜,一眨眼工夫,月亮就不见了。我对妈妈说,月亮真好,就是一会儿就看不见了。妈妈说,你到阳台上试试。跑上晒台,站在高处赏月,果然月亮明亮,硕大。让人不舒服的是,晒台小,住在三层阁的邻居在摇扇子纳凉说话,我站在那儿转身也难,很不自由。

我喜爱仰望月亮

柯兆银

殊的定律。”现代多元社会,健康的文艺生态决定了评论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既然无法回避,不如冷静面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上世纪80年代,“指挥皇帝”卡拉扬率领柏林爱乐乐团再度访美。当时,卡拉扬如日中天,所到之处都是鲜花、赞美和狂热的掌声,但乐评界却保持了难得的清醒,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卡拉扬指挥的乐曲“冰冷的精确有如计算机计算出来的一样”,“过分华丽,过分追求尽善尽美,没有了对立面,音乐的张力也就消失了”。而卡拉扬并未因这些尖锐的评论而大怒,因为他长期生活在这种评论的环境中,早已习以为常,能够做到坦然处之。世纪之初的一个晚

我跑下楼告诉妈妈。她说,你到马路上抬头试试,那会让你更惬意的。于是,我走出弄堂,来到马路上。果然,那一轮月亮高高地挂在天空中,又大又圆,仿佛远在天边,更似近在眼前。我沿着上街沿朝前走,边走边看着美丽的月亮。月亮让我的遐想思绪满天飞翔,我仿佛看见,一只洁白的玉兔拿着玉杵在跪地捣药,吴刚在伐砍五百丈高的桂树,嫦娥在广寒宫里翩翩起舞。仔细地看月亮,除了一片洁白还是一片洁白。我跟随着月亮朝前走,一直走到黄浦江畔。哦,月亮更大更圆了,奇妙的是天上一个月亮,水里也有一个月亮,一阵阵晚风吹过,月亮在水中荡漾不已。有一天我正看着月亮,母亲坐到我旁边,回忆起遥远的中秋夜,她和外婆、外公、舅舅和阿姨聚集在故乡的院子里赏月,大家边吃边喝,有说有笑,其乐融融。“看到月亮,我就会想起那个晚上,想起父母和兄弟姐妹,想起儿时的快乐时光。”妈妈说,“可惜你外公外婆都不在了……”岁月如水流逝,长大成人踏入社会一直忙碌着,晚上依赖的都是灯光,渐渐忘记了月亮。有天晚上,我在马路上行走,猛然抬头,看见两栋高楼大厦之间,静静一轮素面朝天的月亮,月亮,久违了!月亮,无论我注视她还是忘记她,她始终按时出现,始终或丰满或苗条地在天空独自行走,始终放射着柔和的光芒。岁月染白了我的满头青丝,可是月亮一如既往地风采依然。和月亮重逢,从此月亮成为我最爱欣赏的一道天上风景,她不仅美丽,还给我以寄托和慰藉。

浪子回头

刘伟馨

俄罗斯影片《富二代》里的格里高利,是个令人生厌的富二代,仗着父亲有钱,在酒吧勾搭女人,酒驾后,先试图贿赂警察,不成,逃跑时,又把警察撞成骨折。父亲帕威尔把他保了出来。格里高利前科累累,比如,因身上携带违法植物提取物被捕;在一个生日宴会上,砸烂了两间餐厅、弄沉一条船;和一群模特闹出丑闻……帕威尔对他毫无办法。帕威尔通过女友娜斯佳——一位影像编导,认识了心理学家列夫,帕威尔愿意采用任何手段来改变儿子。《富二代》开头的这些镜头,都市街景,高速公路,灯红酒绿,在快节奏中,营造出莫斯科现代感极强的氛围。格里高利的名贵车被拖走,他去追赶,不料,被一辆车撞倒。他醒来的时候,置身于1860年的村庄,他躺在马厩里,变成了一个马夫。这时的场景,迥异于现代都市,完全是典型的俄罗斯乡村景观:木屋、马匹、草堆,还有穿着那个时代服饰的人们,来来往往……可以把《富二代》当成一部穿越电影。从现在穿越到过去,留给格里高利的疑惑是肯定的:我怎么会来到这儿?这里在举办古装扮派对吗?这些人是谁?我的手机呢?他因为没有替马备好笼头被鞭子抽打,逃跑时,问别人:高速公路在哪儿?车站站在哪儿?人们都说他中邪了。格里高利被抓回后,地主打算吊死他,亏得地主女儿阿拉亚求情,他活了下来。格里高利穿越后,很快就会被发现是人为的。电影运用一个过渡段落,通过歌声,还有广角镜头,从原野、草地、河流,拉回到一个主控制室,里面有许多监视屏,坐着格里高利的父亲、娜斯佳和列夫。原来,这是他们策划的一个改造格里高利的项目:花一大笔钱建造一个十九世纪的村庄,雇用一大批演员,在每个角落装上摄像头,通过主控制室指挥,让格里高利还原到最初的环境中,一切重新开始。“不仅要让格里高利浪子回头,而且要创造一个新的人。”这

上,我在海外的街上行走,但见天地广阔,行人稀少,正前方就是一轮圆月。在异国他乡看到月亮,我不由得想起家人,感情之弦被猛烈地拨动了。回到住处,我就写了一封邮件给母亲,发送哥哥代转。他把我的邮件打印出来念给母亲听,母亲听得兴高采烈,津津有味。她让哥哥打电话给我:快快回家!听到母亲的呼唤,我做了一个梦,我和母亲兴致勃勃地坐在月光下聊天。月有阴晴圆缺,不变的是她总是一泻千里,总是爱散着一种温柔的美,总是照亮并抚慰着我们升腾跌宕的情思……

花好月圆中秋夜

篆刻 嘉山雅士

发先生不仅是位国画大家,还是位出色的管理者,他对创作题材的方向把握得很准,继承创新的路子把握得很稳,行政管理的方式把握得很深。他对画院的建设发展有着自己独到的工作方式。集思广益,在关键时刻总能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十发担任院长期间,十分关心职工生活。为了解决职工住房困难问题,他不顾体弱多病,冒着酷暑,挥汗落墨,画就30多幅作品,为职工购买商品住房,当年的情景,我历历在目,曾经亲眼看见十发先生穿着汗衫

不能说这是《富二代》的独创,在法国电影《好梦一日游》中,同样回到过去,同样由演员扮演过去的人物,只是后者中的主角,清楚自己的身份,而前者,格里高利却是身不由己。扮演过去,也会露出破绽,比如:绞刑架的遥控器死机了;木工砍木头忘了摘手表;巧克力包装纸随便乱丢;最惊险的一次,扮演者在格里高利面前说出“电影”字眼,要知道1860年还没有电影。按照剧本,格里高利被阿拉亚救下,他们之间应该有一场激情四射的恋爱,然后面对阿拉亚强势的父亲,格里高利带着阿拉亚私奔,这意味着格里高利为自己心爱的女人负起了责任。可开始,格里高利的所作所为,依然没有改变:没有同情心,自私自利,像一个无赖。用他父亲的话说:“他还是一个人渣,只不过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纪的人渣。”没有人想到,当看管马匹的丽莎出现,所有的情节都不按剧本走。格里高利和丽莎有一个戏剧性的邂逅,然后,格里高利懂得了道歉。他们交往的画面,配上歌曲,美丽而悦目:黄昏时在原野漫步,去马厩喂马,在树林里骑马,在蔚蓝色的湖里划船……尤其在谷仓,360度旋转镜头里,蜡烛燃亮,格里高利奉上一桌美食:生胡萝卜配牛蒡叶、薄切萝卜配黄瓜、明火烤鲤鱼配番茄……他说,他过去是一个混蛋,他在这里是为了反思他过去的行为。他爱上了丽莎。对列夫来说,没有行动的反思没有意义,需要格里高利做出英雄主义的举动。为此,他指使一伙“强盗”抓住丽莎,让格里高利去营救。起先格里高利退缩了,但最后,他鼓起勇气,骑上马,救出丽莎,策马狂奔。结果,跑出建造的房子,跑到了“未来”。尽管格里高利被麻醉枪击昏,被父亲告知没有什么村子、丽莎,但他相信丽莎的存在,在一个马场,他终于见到了丽莎,爱被延续,电影让“过去”和现在,实实在在地重逢了。

精艺报国程十发

王汝刚

短裤,把自己关在“三釜书屋”和“修竹远山楼”的画室中,不停地创作。口渴了,喝几口冷茶,肚子饿了,吃半只面包。眼看只差没几口就能全部完成任务时,十发先生终于累得病倒了。程十发院长的行为和精神感动了画院的同志们,最后,百岁高龄的朱屺瞻先生,二话不说,帮助十发先生画完最后几张画,终于顺利地完成任务。十发先生一生奉行“精艺报国”,不仅用自己的画笔创立了不朽的“程家样”艺术,更是在晚年连续失去爱妻与女儿的双重打击下,毅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把122件毕生收藏的历代珍贵书画无偿捐献国家,高风亮节,令人感动,至今传为美谈。说起来,出身贫寒,一向勤俭,靠稿费为生的程十发本不是什么大收藏家,他收集古



不畏浮云遮望眼,“安贫乐道”贺友直。为公,大公无私的“精艺报国”精神最生动与感人的体现。

十日谈 学艺先学德 责编:杨晓晖